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新诗的传播

荀利波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处在战火前沿的原有文化重镇陆续沦陷,使得原有的现代新诗传播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但依赖于经济、文化、教育及人口聚集而发展起来西南大后方,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土壤。其中,全面抗战的八年,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的出版发行机构占全国 80%以上,迁入和陆续新增发行报刊总数约达到 2000 余种,这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在战时特殊生态和特殊条件制约下出于抗战救亡文艺动员工作的需要,也迫使诗人们因地制宜、克服资源限制,拓展形成了诗朗诵、街头贴诗等新诗传播途径,促进了新诗传播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当然,在战争的持续中,国民党为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而加剧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随资源紧缺、社会负担的加重而加剧了的经济衰退,也成为了制约诗歌传播的负面因素。

关键词:抗日战争;西南大后方;新诗传播;出版业;报刊

中图分类号: I207.2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4.014

任何时代,文学艺术的传播总要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媒介,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或积极、或消极、或促进、或迟滞,共同构成传播的场域环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历大迁移汇聚在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资源,在自身依赖于后方空间得以重组的同时,也形成了战时发展的新形态和新秩序,使现代文学以西南大后方为中心的生产与传播获得新的可能。吕进等也认为:“和以情节为基本特质的叙事文学不同,诗歌的传播问题尤其特殊。而特殊时期的诗歌更是必然有着特殊的传播方式。”^{[1](P3)}事实上,特殊的战时政治对文化战线的重视,以及社会经济在大后方的复兴,为战时诗歌及其他文学艺术传播营构了重要的生态,一大批出版机构、文学期刊、新闻报纸等的迁入和兴办,成为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推进了诗歌创作活动的发展和诗歌艺术的繁荣,而在战时生态环境中也催生了诗朗诵、街头贴诗等诗

歌传播的新途径,拓展了战时条件下诗歌生存空间,也促进了诗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

一、出版发行机构的发展与诗歌文集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起,就与出版发行业及其他报刊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在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出版的图书中,文艺类图书占出版总量的 40%以上,因而,出版业的发展状况,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文学生态状态的晴雨表。出版发行行业的发展,不仅是期刊、报纸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也在诗歌文集的单独出版发行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诗歌传播和创作活动的开展。

继 1937 年 11 月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一大批出版发行机构也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沦陷后先后迁入重庆、桂林等地,并在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物质资源向西南的聚集带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出版发行业也获

收稿日期:2018-11-16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科创新团队科研项目“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研究”。

作者简介:荀利波(1982-),男,云南曲靖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西南民族文化研究。

得较大发展。据统计,抗战时期仅在重庆经国民政府审批的出版机构、书店等就达404家,登记注册的印刷厂有461家,如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开明书局、北新书局、中华书局重庆分局等;桂林在豫湘桂战役之前文化极为繁荣,“1938年冬以后,书店、出版社、印刷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开办。当时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一带,书店林立,门庭若市,被称为‘文化街’”^{[3](P193)},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多达200余家,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的图书总量约2200种,其中文学类的图书就达到892种,占出版总量的40.5%;在贵州,全国性重要的出版发行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在贵阳等地设置了分理机构,文通书局、火柴头出版社、驿路出版社等机构也获得极大发展;昆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文化研究院等高校及其他文化机构迁入后,文化事业获得了极大生机,除正中书局等大型出版发行机构在昆明设立的分局外,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出版发行机构还有进修出版教育社、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等,以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自行组织的图书、刊物等的出版;成都的印刷出版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也有所发展,其中较活跃的出版发行机构如正中书局成都分局、大东书局成都分局、中华书局成都分局、中华出版社等,还有一大批书业新办,仅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开办的出版发行机构就约30余家,1937年到1949年在祠堂街及其附近一带新开设书业就达约120家。据国民政府1942年发布的全国十个区图书统计数据显示,重庆、桂林、成都所出版图书占全国总比分别达到33.3%、25.7%、12.1%,稳居全国前列。

诗人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响应时代的号召,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虽然日益维艰,但创作热情却空前高涨。同时,依赖于西南大后方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及人口聚集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出版事业,进一步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土壤。为更清晰的呈现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业在诗歌传播中的情况,笔者依据刘福春先生著作《中国新诗编年史》,对抗战时期诗人们出版的诗集做了统计。经统计,从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出版的诗集、诗文集在380部以上,涉及诗歌出版的出版发行机构

有202家,出版2部及2部以上诗集、诗文集的出版发行机构为54家,所出版诗集数占出版总数的54.21%;仅出版1部诗集的出版发行机构为148家,所出版诗集数占出版总数的38.95%;其余出版机构不详。就抗战时期迁移的基本规律来看,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到1938年底这段时间,大多出版发行机构还处在流散、搬迁过程中,但仍然出版发行了不少于69部诗集,已属难得;而到1938年年底以后,全国出版机构中的约80%几乎都汇聚在西南的重庆、桂林、成都等地;出版诗集较多的臧克家、王亚平、穆木天等人也长居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艾青这一时期也处于高产阶段,出版的诗集不少于13部,他虽在重庆等地停留时间不长,但在重庆等地期间诗歌创作十分活跃,到达延安后也一直与西南诗坛保持联系,大多作品都在西南刊发或出版,对西南及中国诗坛影响极大;与艾青类似的还有田间、何其芳、路易士(纪弦)等人。基于此,我们可以判断,至抗战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辐射全国的出版发行版图,而出版发行业在诗歌出版中的实绩也表明它在抗战时期仍然是诗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也因此促进了抗战时期现代文学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文学发展版图的形成。

从当时出版的诗集情况来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到抗战结束所出版诗集呈现出明显的时代主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到1938年年底这段时间,民族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诗人们也积极投身到了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创作主题集中突出了发出救亡的呼声、抗战号召和对抗战前线的书写,如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1937年)、任钧的《战歌》(1937年)、郑振铎《战号》(1937年)、温流的《最后的吼声》(1937年)、萧剑青的长诗《战歌》(1937年)、克锋的《赴战壮歌》(1937年)、雷石榆的《国际纵队》(1938年)、雄子的《总动员》(1938年)、陈残云的《铁蹄下的歌手》(1938年)、臧克家的《从军行》(1938年)、王亚平的《中国兵的画像》(1938年)、溅波的《战火》(1938年)、冯玉祥的《敌军反战》(1938年)等,大多发出着激昂的战斗的声音。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不仅是诗人们普遍的表达愿望,而且也符合当时时代和读者的接受需求。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及其之后,随着对现实状况认识的深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的激情逐渐消退,虽然为抗战呐喊仍然是诗人们创作的主要内容,如芦荻的《驰驱集》(1939年)、王亚平的《祖国的血》(1939年)、筱薇的《泪里的花叶及其他》(1939年)、胡风的《为祖国而歌》(1939年)、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1939年)、斯因的《祖国的吼声》(1940年)、刘雯卿的《战地诗歌》(1943年)、张泽厚的抗战史诗《昆仑关》(1943年)、溅波的《前进!中国兵》(1945年)等,但也出版了一大批针砭时弊、揭露后方社会问题和充满个人抒情色彩的诗集,如王统照的《欧游散记》(1939年)、邹荻帆的《尘土集》(1940年)、艾青的《向太阳》(1940年)和《火把》(1941年)、袁水拍的《人民》(1940年)、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942年)、冯至《十四行集》(1942年)、方殷的《平凡的夜话》(1942年)、李金发的《异国的情调》(1942年)、孙望的《煤矿夫》(1943年)、曾卓的《门》(1944年)、穆旦的《探险队》(1945年)、何其芳的《预言》(1945年)等,在主题上也呈现多样化。这种出版业在诗歌传播中的变化,也反映出了大后方文化生态在战时生态下的变化——战争持久,抗击外侮的同时,生活的多样性需求也逐渐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出版发行机构本身兼具图书、报刊出版和发行销售的职能,如商务印书馆就创办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尤以《小说月报》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影响巨大。同时,也有许多杂志社本身也出版发行图书,例如文聚社定期出版《文聚》杂志,也出版穆旦的《探险队》等诗集;春草社定期出版《春草》,也出版了王亚平的《火雾》、索开的《荒原的声音》等诗集。这些期刊借助刊物更新速度快、传播广、有固定读者等优势,对出版的图书进行广告宣传,扩大了图书的传播面。无疑这也扩大了诗歌在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间的传播。

从整体上看,抗战八年诗歌文集的出版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大多数出版社的出版经营状况也并不理想,甚至许多出版发行机构存在周期极短,因而出现了出版业看似十分兴盛但图书出版体量不大的矛盾的现实,这也显现出战时出版业生存的艰难。

二、《抗战文艺》等报刊媒介的诗歌传播

在出版业对诗歌的出版整体表现疲软的情况下,报刊媒介的发展,对诗歌创作与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报刊媒介以其出版周期短,能迅速将最新作品向读者传播;容量较小,更适合刊载具有“短小精悍”文体特点的诗歌;能借助广告等途径获得出版经费,因而作品刊出的“入门”标准相对较低,使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有更多发表诗作的机会等优势,从而在诗歌传播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各大报纷纷迁来重庆出版,全国许多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都来到重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港、澳更有大批文化人来到内地,重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的中心”^{[4](P304)}。大迁移中迁入的报刊、西南大后方原有的报刊、以及在西南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中新创办的报刊,有些有政党背景,如《七月》《新华日报》《文艺月刊》《中央日报》等,也有很多报刊努力使自己站在中间位置,如《抗战文艺》《今日评论》等,还有许多是学生主导创办的刊物,如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创办的《文聚》等,虽显复杂,但总体上构成了空间被压缩在西南大后方的中国现代诗歌多元、互补的传播格局。西南大后方文学期刊和新闻报纸及其副刊主要是集中于重庆、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主要城市,但由于躲避侵华日军轰炸等缘故,也有一些分散在一些县镇。几乎与诗人的迁移一样,为广泛的利用文艺武器开展抗战动员和有针对性的与侵略者开展文化斗争,随诗人、其他文人和文化机构等的迁移,从1937年到1938年年底是全国及西南大后方报刊种类增长最快的时期,1939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每年都有数量不少的新报刊创办,但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报刊的停刊。粗略估计西南大后方先后出现的报刊总数约为2000余种。其中,重庆汇聚了大量学校和文化人,先后出现的报刊数量最多,总数达1000余种;云南先后出版报刊达到312种,桂林达到273种,成都共有320多种,贵州仅出版的文艺报刊数量就约70多种,出版报刊总数约在200余种。虽然这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农林、教育及艺术类的报刊,但如此庞大的报刊出版基数,为西南大后方诗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据丁捷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中依据刘增人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对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出版情况所作统计,抗战时期

重庆新办文学期刊155种、成都92种、桂林79种、昆明50种,贵州约为10余种。也就是说,抗战期间西南大后方新创办的文学期刊数应就达400种以上,还有许多报纸的副刊,同样承担了诗歌的传播任务,共同构成图书出版之外诗歌传播的主阵地。

作为诗歌传播途径的报刊媒介,据其对文学作品传播类型的差异,显现出三种不同类型,即综合型文学期刊、专门的诗歌期刊、新闻报纸的文艺副刊,并因此也体现出传播上的差异。

综合型文学期刊不仅刊登诗歌,也刊登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的作品,它们虽然不是单纯的诗歌传播媒介,但由于它们文体类型相对较多,能适合更多读者阅读的口味,因而,影响还相对较大,如《抗战文艺》《七月》《文聚》《文艺阵地》《文艺月刊》《文化岗位》等。其中,《抗战文艺》从抗战初期创刊一直到抗战结束从未间断出版发行,共编辑正刊、特刊达80期之多,虽不是纯粹的诗歌专刊,但从它创刊以来,就一直在“文协”动员并领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战文艺运动”的宗旨下,倡导“为大众的文化而战斗”,汇聚了艾青、臧克家、胡风、穆木天、高兰、田间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据统计,正式出版发行的《抗战文艺》中一共刊载了诗歌约140余首、诗论12篇,“尤其是在《抗战文艺》的第一年,即第1卷第1期起至第3卷第12期止,诗歌创作的数量在小说、论文、戏剧、翻译介绍、书评等各种体裁中居于首位”^{[5](16)},足见《抗战文艺》对诗歌传播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意义的重视。《抗战文艺》作为“文协”的会刊,它不仅在积极实践着“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目标,刊发了艾青的《反侵略》、王平陵的《觉醒罢!出卖祖国的奴役!》、力扬的《黎明》、任钧的《诅咒和感谢》等富有启蒙色彩的战斗诗歌,而且也通过这一传播媒介,积极引导着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从早期对包括诗人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和全国民众的“鼓”与“呼”,到通过诗歌座谈会等方式,检讨诗歌大众化运动中的艺术形式等问题,从朗诵诗、街头诗的讨论到叙事诗等体式的倡导,从国外诗歌作品翻译到国外文艺理论推介,在诗歌传播中形成了对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建构。《七月》也是影响极大的综合型文学期刊,延续“革命文学”的理想,力图将《七月》打造为“意识战线”上的

坚固阵地,因而,在胡风的主持下,他们吸引和扶持了一批革命现实主义诗人,在《七月》和《希望》上刊发了胡风的《血誓——献给祖国底年青歌手们》、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走——写给农民》、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田间的《给战士》等诗歌共计达到226首之多,也刊发了胡风、艾青、柯仲平等人一批重要的诗论,如雪韦、柯仲平等的《关于诗歌朗诵:实验和批判》、胡风的《关于诗与田间底诗》等,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外,《文艺阵地》刊发了200余首诗歌、《文学月报》刊发了48首诗歌、《天下文章》虽仅刊出11期也刊发诗歌44首;还有《文聚》《文艺月刊》《今日评论》等刊物虽也是综合型文学期刊,刊发诗歌、小说、文艺理论等多种文类的作品,但它们有着一批相对固定的创作群体,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诗歌创作趣味,在诗歌传播中同样引领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专门的诗歌期刊基本以刊发诗歌作品为主,间杂有诗论、外国诗歌翻译等作品,如《诗》《战歌》《诗创作》《诗星》《诗前哨丛刊》《诗报》《诗垦地丛刊》《中国诗艺》《诗叶》等。很明显的是,抗战初期诗人们创作诗歌和创办诗歌刊物的热情极为高涨,如果单从创办刊物的种类上来说的话,诗歌类的刊物出现的种类几乎是最多的,分布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具备铅印条件的用铅印,不具备的则用油印,刊载的作品类型与综合型文学期刊相比虽属单一,但就诗歌本身而言,也是种类繁多,特别是适应了多种诗体创作的尝试。例如,还在诗人们处于流散时期,锡金、穆木天在武汉创办的《时调》就率先展开了对朗诵诗的介绍,把朗诵诗运动推介给了诗坛和读者们;“文协”昆明分会和其所属的“救亡诗歌社”创办的专门性诗歌刊物《战歌》从1938年8月创刊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停刊,刊发外省诗人、云南本土诗人和解放区诗人的作品,涉及反映抗战前线、后方生活等方面的诗歌,还刊发了对惠特曼、莱蒙托夫等诗人诗歌的翻译和30余篇诗论,在诗歌大众化、通俗化、诗歌形式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被茅盾誉为“闪耀在西南天角的诗星”。其他很多专门的诗歌刊物在相应时代的号召中积极探索诗歌创作的大众化,增强诗歌在普通大众中的传播,对诗歌的语言、形式、节奏

等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从而也形成了一些诗歌刊物自身的办刊特色,也形成了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的不同开掘,在讽刺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艺术上取得了新发展。

新闻报纸的文艺副刊也是抗战时期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主要依托于新闻报纸的发行渠道,会因报纸的读者市场而影响到诗歌的传播面。《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几个报刊,其文艺副刊对诗歌传播的效应远在一般期刊甚至文学期刊之上。例如,《大公报》在1937年9月18日创办了副刊《大公报·战线》,在第1号上就刊发了锡金的朗诵诗《老家》。其后,《大公报·战线》不仅积极支持诗歌传播,而且着力于对诗歌大众化运动的推动,刊发了一大批具有探索性的诗歌和诗论,如高兰的朗诵诗《放下你那支笔!》《迎一九三九》《我的家在黑龙江》《这里是不是咱们的中国》等,胡绍轩的报告诗《我有一个报告》、穆旦的《我》等诗歌和王亚平的《西北的抗战歌谣》、臧云远的《诗的音韵美》、陈纪滢的《新诗朗诵运动在中国》等诗论。诗人穆木天、邹荻帆、蒲风、臧克家、王亚平、老舍、方殷、陈梦家、任钧、姚奔等,都有不少诗歌借助这一副刊得以发表和传播。《新华日报》在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背景下自从在武汉创刊以来就利用舆论优势,积极动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文协”的建立,积极推动诗歌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倡抗战的、现实的文学和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刊发了郭沫若、胡风、何其芳、艾青、臧克家、臧云远、胡风、光未然、力扬、老舍等多人的诗歌和诗论,成为了中华民族在争取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前进的号角”。《新华日报》还利用其副刊,担负起了诗歌传播和艺术引领的重任。特别是在诗歌朗诵运动、街头诗运动、民歌运动等文艺运动中,《新华日报》副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传播诗歌作品的同时,也传播和引领了文艺发展的方向。此外,西南各地还有如《广西日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救亡日报》《西南日报》《新蜀报》《新民报》《扫荡报》《国民公报》等数百种新闻报纸辟有文艺专版或是副刊,大量刊发诗歌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传播。

总体来说,报刊媒介在抗战时期以其传播渠道的多样性、版面的灵活性、出版的经济性和受众

的广泛性,仍然是诗歌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它们不仅直接刊发诗人作品,而且还借助其更新较快的优势发布诗人、诗歌活动和诗集出版信息,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有效传播,丰富了创作生态环境。虽然有些报刊存在办刊质量不高、文章水平参差不齐、发行时间无以保障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战火之下这份热忱和激情的存在,无疑丰富了诗人们开展诗歌创作活动的阵地,也激励了现代诗歌高歌的豪情,对诗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不容否认。

三、诗朗诵、街头诗等传播途径的发展

战时的文艺工作,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战争动员的宣传任务,郭沫若在《文艺与宣传》一文中就曾说道:“在平时颇有一部分人不肯相信,甚至加以攻击,到了战时却愈见显示着这是道破了一片真理……真的,无论你是赞成或反对,文艺的本质不外是宣传。”^[6]为着“宣传”的这个战时需要,诗人们也尽可能地拓展和创新宣传的途径。图书出版、报刊杂志刊文作为诗歌传播的主体形式,因战争原因,其对诗歌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限制,更不要谈战时对大众的新的启蒙。因而,诗人们克服资源等限制,因地制宜,开拓一些新的传播途径,例如诗朗诵、街头贴诗等。“朗诵是把诗歌和舞台表演结合起来的传播方式,街头诗是把诗歌从桌面推向公众空间”^{[1](P3)}。诗朗诵和街头贴诗丰富了诗歌传播的途径,促进了诗歌向底层民众的传播,极大地推进了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发展。

诗歌朗诵并非是抗战时期发明的专利,而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传统,而中国现代新诗朗诵运动的高峰则是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并因它的出现推动了诗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更推进了诗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爆发后,诗歌朗诵运动在高兰、锡金、穆木天、常任侠等人的推动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之所以蓬勃兴起,主要是它适应了中国广泛动员全民族抗战的战时生态需要。力推诗歌朗诵运动的陈纪滢曾这样说道:“只能够印在纸上供知识分子读一读的文字,在现实是已经不够用了,……因为我们正在生死线上挣扎,……并且我们的大众还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7](P30)}锡金也曾说:“诗歌工作者要负起抗战时期的伟大的救亡的

任务。要号召光明和胜利的企求,要打破诗歌自身的厄运,非得替诗歌另找一条出路不可,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法有一个,是朗诵。”^[8]

1938年2月,大路书店出版了诗歌朗诵运动的主要推动人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抗战文艺》还专门为诗集的出版刊发了广告,对诗歌朗诵和高兰的朗诵诗给予了高度好评,并肯定了诗歌朗诵是教育和组织大众的“宣传工具”,契合了时代的要求;1940年1月28日乐群社专门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晚会,朗诵了《海燕之歌》《火把》吸引了近千名青年观众观看;1941年端午节在重庆举办的第一届诗人节庆祝晚会上,高兰、常任侠、光未然等人朗诵了《离骚》等诗歌;1942年10月19日,“文协”桂林分会为募集基金,在百东门剧场举行的演出会中,除音乐、戏剧等之外,还包含了由凤子、韩北屏等人演出的诗歌朗诵。除此之外,校园中的师生们更是热衷于诗歌朗诵,聚集在西南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都开展了丰富的校园文艺活动,一些社团的集会中诗歌朗诵是必备的节目,例如西南联大的冬青社就多次组织诗歌朗诵,不仅邀请闻一多、李广田、雷石榆等诗人参加,还采取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法语等多种形式的朗诵等。在诗人们竭力的倡导和组织下,许多在校的学生、文艺爱好者、戏剧演出者等组成的宣传队伍、战地服务团、慰劳团等,他们把一些诗人的诗歌以朗诵的方式传到了街头巷尾,传向了农村和抗战的前线,促进了诗歌的传播,也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这不仅对于诗歌生态有所补益,同样对战时的社会生态改良也有积极意义。

与诗歌朗诵运动异常活跃相比,以墙壁、大石头、电线杆等为介质书写诗歌的形式的街头诗运动在重庆等西南大后方却显得有些落寞,即便如此,它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在西南大后方的诗歌传播中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与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一样,街头诗运动的开展也是应合动员全民族抗战的现实要求,正如1938年8月15日《新华日报》刊发的《街头诗运动宣言》中所说:“在今天,因为抗战的需要,同时因为大城市已经失去好几个,印刷、纸张更困难了,我们展开这一大众街头诗歌(包括墙头诗)运动,不用说,目的不但在利用诗歌作战斗的武器,同时也就是要使诗歌走

到真正的大众化的道路上去。”^{[9](P242)}

街头诗作为一种诗歌传播途径,具有自身的优势。街头诗不像纸质的图书、报刊需要依赖于纸张、印刷,甚至还需要一定的购买力,在和平环境下,这些或许并不会成为诗歌传播太大的制约因素,但在战时生态环境下,却必然成为制约诗歌传播的重要因素;街头诗也不像诗歌朗诵需要依赖于传播对象的当下在场。街头诗在传播的媒介上,正由于纸张、印刷设施等条件的限制而获得拓展,它主要借助于街头巷尾、交通要道随处可以利用的固定的媒介或可移动的媒介,如固定的墙壁、电线杆、石坎等,可移动的如战士们枪杆、箩筐、各型车辆等,只要有一支粉笔、毛笔或者是其他可书写的物品,诗人们就可以将诗歌写在这些物质上,以这些常见物质为媒介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传播场。

1940年6月6日,“文协”桂林分会诗歌组在桂林组织开展街头诗运动,他们组织通过编辑出版大幅诗壁报、出版《六月街头诗宣言》等诗歌特辑,并以传单形式在街头散发,引起社会和诗坛极大反响。校园中的学生们很快借鉴了街头诗的方法,将创作的诗歌以壁报、手抄报等方式在校内传播。同时,西南联大的冬青社等学生社团还带着他们创作好的诗歌走向街头巷尾、走向乡村,写在墙壁、树干等上面,促进了诗歌的传播,也助推了诗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随着街头诗运动范围的扩大,文艺界对此也极为关注:《抗战文艺》《中国诗坛》《七月》等刊物发表多篇田间、林山等人创作的街头诗,并刊发了多位诗人、文论家的街头诗论文;《中国诗坛》第五期刊发了林山的《敬礼》《给难民》《不要吵架》《送出征战士》四首街头诗,还刊发了高詠的诗论《论街头诗歌》;《七月》不仅刊登了田间等诗人多篇街头小诗,还刊发了多篇诗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胡风的《关于诗与田间底诗》,对杨云璈对田间诗作“拘泥于简短的形式,过分的吝啬诗句底容量”^{[10](P84)}等的质疑做出回应,高度评价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底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10](P86)},这也相当于对战时生态下街头诗运动对诗歌传播及其意义的极大肯定。田间曾这样回忆描写街头诗运动中的一些现场情景:“写在墙头或贴在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

山羊的,有嘴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1](P105)}这既表明底层大众对诗歌艺术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否认“好奇”,但由此也正实现了诗歌本身传播的目的。

四、结语

虽然抗战时期中国的信息、物资流通与当今毫无可比之处,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制造的文化进攻以及凝聚抗战意志和战斗决心的需要,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文化抗战的重视,不仅设立了“第三厅”专司文化事务,而且还设立总站位于重庆、分站及支站遍布各战区及游击区的“中央文化驿站”,以“办理关于阐扬本党理论及有利于抗战建国书刊之传递与散布事宜”^[11],为了做好书报的传播,还专门出台了《战地书报供应办法》,完善了各地递运、邮运网络,从而提升了信息流通能力。这些传递条件的改进,不仅使西南大后方各地间的沟通和信息传播得到加强,也促使了西南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格局的形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战争的破坏性从来不会留有余地,更何况是在地域辽阔但又贫穷落后的中国土地上,它无论是对中华民族劳苦大众的生命戕害,抑或是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破坏,都是不可估量的。即便是在作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学中心的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随着战争的持续,国民党为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而加剧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随资源紧缺、社会负担的加重而加剧了的经济的衰退,无不成为破坏诗歌传播生态的负面因素。

首先,战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导致了出版发行机构、报刊、印刷等行业发展受挫。从战争爆发初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进入一段流徙的漫长历程,甚至于在西南的聚集本身也是流徙途中的短暂停留,抗战结束后的“复员”潮,几乎一下子将西南抽空,文学中心瞬间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说,战争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从北平到上海,再从武汉到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不仅中国现代诗人与其他作家们在四处奔逃,同样奔逃的还有与诗歌传播相关的这些各类图书、报刊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我们在统计中也发现,很多出版发行机构的出版发行活动常常仅维系几个月即告停,而也有很多报刊,特别是期刊往往出至两三期也告

停刊。这就导致了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出版发行机构和报刊总体数量多,但连续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制约了诗歌等文学作品的传播,也对诗歌创作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国民政府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严重挤压了报刊媒介和出版发行机构的生存空间,制约了诗歌传播。虽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国共两党为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和鼓励文化事业发展,以服务抗日斗争,为诗歌等文学艺术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生态环境。但是,国民党政府也始终未曾完全放弃对党派异见的打压,为了维护其反动、独裁统治而实施文化专制政策,不仅实施“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治,成立了全国最高的图书审查机构“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和地方的“图审处”负责图书审查工作,而且还先后出台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修正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出版品审查法规及禁载标准》等文化专制政策、法规,限制进步刊物和进步作品的传播,许多进步刊物和图书遭到查禁。“据国民党中宣部和图审会档案显示,抗战期间仅重庆一地被查禁的图书就有1000多种”^[12]。由此可见其对创作生态破坏之重,对诗歌传播影响之大。

最后,战时经济不仅因与诗人生活紧密相关而直接影响诗人的创作,同时更对诗歌传播造成直接影响。诗歌文集出版发行或报刊发表等途径,不仅是很多诗人、小说家等文艺工作者曾经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诗歌传播的主要途径。但不论是诗歌文集的出版发行还是借助报刊刊发诗歌,都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纸张生产、纸张购买、印刷材料、印刷设备、编辑排版等,每个环节都需要经济作为基础,而任何一个环节的衰微,也必然导致出版生态的破坏。抗日战争进入中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战争支出持续加大,但内部腐败也更加严重,财政收支赤字惊人,而滥发纸币进一步加剧经济环境恶化,物资供应更加困难、物价不断上涨。金陵大学编制的一组物价指数统计数据显示:“1937年物价指数比1936年增加15%,1938年比1937年增加16%,1939年比1938年增加38%,1940年比1939年

增加 284%,1941 年比 1940 年增加 249%,1942 年比 1941 年增加 296%,1943 年比 1942 年增加 305%,1944 年比 1943 年增加 369%。”^{[12](P74)}这种急剧攀高的物价,使得无论是纸张制造业、还是印刷业都遭到严重影响,图书出版和刊物办刊成本急剧攀高。与此同时还有物价上涨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让一般的工薪阶层读者难以承担,势必造成恶性循环,严重破坏诗歌等文学作品的传播生态。

但必须肯定的是,整体上,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而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是创作活动中具有互动关系的环节,就如创作者与客观世界、文学接受、文学传播所共同构成的创作活动整体一样。正是这种互动的并互相影响的关系,使它们成为相互连接的整体,并共同构成了创作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要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中抗战热情的高涨,刺激了全国同胞对文化的需求,而抗日斗争的严峻现实,也迫切需要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不仅参与到抗战文化斗争的“笔

部队”之中,而且还要以诗歌“短小精悍”和极具“煽情”性、富有宣传价值的这一武器,积极动员广大民众、鼓舞大众抗战的意志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因而使诗歌受到文艺界的重视。战争催逼下形成的西南大后方和战时的特殊生态,不仅使诗人们成为了一支“笔部队”,而且要在争取民族和自我个体生存的现实面前调整诗歌创作的表达方式,以使诗歌更能发出战斗的力量,动员“一切力量”,如果说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作为诗歌接受群体几乎是延续了战前二十多年新诗发展的传统,那么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市民阶层的动员需要,则再一次将“如何真正大众化”的问题摆在了诗人们的面前,这不仅迫使诗人们对语言、形式等诗歌的表达艺术做出积极调整,而且也成为图书出版、报刊发行等诗歌传播形式之外,诗歌以朗诵和街头诗等途径进行传播的根本动因,并因接受群体向普通底层大众的主动转向和传播途径的调整,对诗歌创作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什么样的诗歌适合于朗诵、什么样的诗歌适合于街头传播,这再次促进了诗歌在文体上发生新变,呈现出诗歌创作生态的复杂性。

参 考 文 献

- [1] 吕进,等.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 [2] 沈旻.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化出版及产业发展调查分析[J].艺术百家,2008,(3).
- [3]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4] 姚江屏.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A].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5] 林虹霓.《抗战文艺》中的诗歌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0.
- [6] 郭沫若.文艺与宣传[N].大公报,1938-03-27.
- [7] 陈纪滢.序《高兰朗诵诗集》[A].高兰.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 [8] 锡金.诗歌和朗诵[J].文艺月刊,1938,(12).
- [9] 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10] 胡风.关于诗与田间[J].七月,1940,(2).
-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立“中央文化驿站”有关史料选[J].民国档案,1987,(1).
- [12] 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The Spread of New Poetry in Southwest Rear Are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XUN Li-bo

(School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College, Qujing 5501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with the original cultural towns at the war forefront falling into the enemies' hands, the original communicative ecology of the modern poetry has been seriously destroyed. In the meanwhile, southwest rear area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il for the spread of new poetry basing on aggregation of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population. Among them, in the eight years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Chongqing, Guilin, Chengdu, Kunming and other citie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newly-adde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ached 2,000-plus,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spread of new poetry. In addition, under the special ecological and wartime conditions, to meet the need of mobilizing artists for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approaches for new poetry communication, such as poetry reading and street poems have been made through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fact, during the war, the Kuomintang's cultural dictatorship, which was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governance, and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the increasing heavy social burden have become a negative factor restricting the spread of poetry.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southwest rear; spread of new poetry; publishing industr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责任编辑:庄暨军)